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标准 -----我们如何看待中介语<sup>1</sup>

Dr Wen Xiong  
La Trobe University

## English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ssue of the criteria of SLA based on three longitudinal studies to the reference of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 L2. Debating the acquisition criteria is motivated by the epistemic views shifting from more target-language oriented approaches to ones oriented toward the learners' interlanguage and tracking the learner's language developmen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L2 learners are considered to take active role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can be seen as benefiting from their own IL resources and insights gained into the general organization of language. Therefore, the notion of the first attempt (*Emergence*) at or use of the second language by the learners has been increasingly considered as the evidence to define a key point in their learning track rather than when it has become precise and correct (*Mastery*).

---

<sup>1</sup> . This paper has been presented on the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Teaching Chinese in the world, Beijing, 2005.

考察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如果想对学习者的中介语发展进行描写，不管通过自然习得，还是通过课堂学习，研究者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学习者已经习得了某个语言项目？这就是习得的标准问题。习得的标准表面上看是一个分析语料的方法问题，其实如何确定这个标准反映了研究者对中介语的不同认识。如果我们把中介语看作是一个“重构连续体”（restructure continuum）（Selinker, 1972），我们应该如何描写这个连续体？既然这个连续体是在动态变化过程中的，那么，它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混合体，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模式（pattern）？

### 1. 准确率标准（Mastery criterion or accuracy criterion）

语言习得的很多研究，包括第一语言习得和第二语言习得采用的都是准确率标准（Mastery criterion or accuracy criterion）（Brown 1973; Shumann, 1976; Dulay & Burt 1982; Krahsen 1982; Pica 1984）。准确率标准最早采用于第一语言习得，它基于一个认识（Cazden 1965）：当学习者的使用准确率达到 80% 时，习得就达到了稳定（stability）状态。因此，研究者通过考察当学习者使用正确形式于三至五个强制性语法环境中达到 80% 或 90% 时，就认为学习者习得了这个语法项目。这个标准后来被广泛沿用到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并且推导出一个认识：准确率高的项目被认为是先习得，准确率低的项目被认为是后习得。

准确率标准至今仍然使用于考察第二语言习得，并且考虑逐步克服其中的一些问题。早期使用的 SOC 分析方法（Suppliance in Obligatory Context Analysis）主要考察强制性语法环境中的正确使用形式。比如说，eg: He goes to school everyday. 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是动词词素-（es）出

现的强制性语境。如果学习者第三人称单数动词的变化使用的准确率达到了 80%-90%，就可以认为习得了这个语素。

正如前文所述，SOC 分析方法最早使用于第一语言习得 (Brown, 1973)，它主要考察了学习者在多大程度掌握了某个语言形式，对于儿童的第一语言的发展也许比较有说服力，但是对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中介语的发展复杂得多。就强制性语境而言，在一定的强制性语境条件下，学习者也可能使用和目的语不一致的形式或者回避使用某些形式。因此，为了克服诸如此类的问题，TLU 分析方法 (Target-Like Use, TLU analysis, cf., Rosansky, 1976; Andersen, 1977; Lightbown et al, 1980; Stauble, 1981; Lightbown, 1983; Pica, 1984)。在计算准确率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学习这在一定的强制性语境中误用 (misuse) 和过度使用 (overuse) 语言形式的两种情况，形成了如下的公式 (Pica, 1984, p. 71)，即：

$$\text{学习者类似目的语的使用} = \frac{\text{强制性语境中使用的所有正确形式}}{\text{强制性语境中使用的所有正确形式} + \text{非强制性语境中使用的所有形式}}$$

由于加入了非强制性语境中使用的所有形式 (N suppliance in non-obligatory contexts)，显而易见准确率的百分比就发生了变化，因此当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按照 SOC 分析方法，如果学习者在使用某一语法项目的时候在五个强制性语境中的所有用法都正确，就会得到 100% 的准确率；但是按照 TLU 分析方法，如果学习者还在不需要使用这个语言形式的语境中也使用了五次，得到的准确率就是 50%。这样，分析的结果也就大相径庭了。

SOC 分析方法和 TLU 分析方法同样都面临一个问题：形式型语言因为有较强的形式标志，如何确定强制性语境比较容易操作，但是仍然有一些语言成分出现的环境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非强制性，如何确定这些成分就存在一定的局限。

Wang (2001) 其博士论文《汉语中介语的初期阶段：对三名母语位英语的汉语学习者的考察》(*The Early Stages of Chinese Interlanguag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by Three Native English Speakers*)用 TLU 分析方法对三个零起点母语为英语的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初级阶段的学习进行了考察，重点是否定系统，疑问系统和时间系统得习的。在采用这个习得标准的时认为考察学习者的类似目的语的用法在句子层面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只有放在话语层面才能确定该语言项目的使用是否正确。因此他把上述的公式作了一定的调整，用于分析汉语的习得，即：

$$\text{学习者类似目的语的使用} = \frac{\text{话语语境中使用的所有得体形式}}{\text{话语语境中使用的所有得体形式} + \text{话语语境中使用的所有不得体形式}}$$

具体进一步量化为：每两周收集一次的最后语料中学习者的类似目的语的使用正确率连续三次达到 80%，其中至少出现于五个相关的（话语）语境。（p. 50）。以“不+V”的否定结构的考察为例，语料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一 “不+V” 的否定结构的 TLU (Wang, p. 53)

	<b>Sara</b>	<b>Lisa</b>	<b>Peter</b>
语料样本 1 (0.5mo)	36% (9/25)	39.1% (9/23)	31.6% (6/19)
语料样本 2 (1.0mo)	81.5% (22/27)	72.7% (8/11)	38.5% (5/13)
语料样本 3 (1.5 mo)	82.5% (33/40)	83.3% (10/12)	77.8% (14/18)
语料样本 4 (2.0mo)	83.3% (30/36)	82.6% (19/23)	80.0% (12/15)
语料样本 5 (2.5mo)	N/A	84% (21/25)	81.8% (9/11)
语料样本 6 (3.0 mo)	N/A	N/A	84.2% (16/19)

根据上文所界定的标准和公式，从上面的表格中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p. 53）：Sara, Lisa 和 Peter 分别在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收集的语料期间习得了“不+动词/形容词”结构。换言之，Sara 最早习得了这个否定结构。同时，与其他否定结构相比，“不+动词/形容词”结构最早获得稳定，因此认为这个结构最容易习得。

大部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实证研究都是采用准确率标准，这个跟研究者所使用的语料和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一部分研究使用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中介语语料库的语料，如王建勤（1997）《“不”和“没”否定结构得习得过程》，施家炜（1998）《外国留学生 22 类现代汉语句式得习得顺序研究》，孙德金（1999）《外国学生汉语体标记“了”“着”“过”习得情况的考察》。另一部分研究的语料主要来自于学生书面的作文及相关练习，如钱旭菁（1997）《日本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邓守信（1999）《The acquisition of “le” in L2 Chinese》，黄月圆 & 杨素英(200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把”字句研究》，陈郡&周小兵（2005）《比较句语法项目的选取和排序》，伏学风（2005）《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量词研究》。

其实，使用准确率标准考察的就是学习者中介语发展成熟时期的特点，这和最早采用这一标准考察第一语言的发展的中心始终是一致的，即认为只有稳定的特征才是中介语习得的特征，准确率标准虽然至今仍然被广泛应用。但是从八十年代起就不断的受到批评(Meisel, Clahsen & Pienemann 1981; Ellis, 1985; Larsen-Freeman & Long, 1991)。批评的主要方面是：准确率标准（Mastery criterion or accuracy criterion）是一个量的标准，而非质的标准，用准确率来衡量学习者中介语的发展，实际上使用目的语的标准来衡量中介语，只揭示了语言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因而忽略了中介语本身的动态发展特点；只考察正确的语言产出不能对中介语整体系统作出正确的估计。正如科德（1967， p. 24）指出的，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是由不同阶段组成的，学习者的错误也是这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译）。

## 2. 初现率标准（emergence criterion）

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对学习者的自身和其习得全过程的考察的日加重视，初现率标准（emergence criterion）被采用到研究中，尤其是纵向研究中（longitudinal study）。研究者认为对中介语的考察不应该等到中介语系统变得较为成熟的时候才进行，而是应该从一开始就考察它从出生，成长到成熟的一个渐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被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积极的介入角色，从自己的中介语发展中获益并得到提高。因此，学习者的首次尝试，最初使用的第二语言成分被认为是习得的起点。

初现率标准（emergence criterion）最初由 Meisel, Clahsen and Pienemann (1981)在他们提出的“多元发展模型”

(*the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SLA*) 中使用。多元发展模型基于 ZISA 项目 (*Zweitspracherwerb Italienscher und Spanischer Arbeite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Italian and Spanish Workers*) 的研究, 这项研究是以移民德国的成年人 (20 名来自意大利, 19 名来自西班牙, 6 名来自葡萄牙) 习得德语作调查, 调查的语料包括横向研究和对其中 12 名学习者为期两年的纵向研究。其结论为, 德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经过前后六个特定次序 (Clahsen, 1984), 调查对象最初的语言表达是以孤立的单词和一些套话 (固定表达方式) 为主, 然后遵循一种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的语言发展顺序。SAMPLE (Pienemann & Johnston, 1987, *Syntactic and Morphological Progressions in Learner English*) 继续了 ZISA 的工作, 调查了澳大利亚成年移民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发展情况, 亦提出了以 ZISA 原则为框架的英语习得六个特定次序。初现率标准已被用在句法, 语素的习得方面, 并由 Pienemann 在其《语言处理和第二语言习得: 语言处理论》(1998) 中得到进一步细则化。

Pienemann (1998, p138) 是这样定义初现率标准的:

从话语处理的角度讲, “初现” 可以被认为在某一时刻, 某种技能已经原则上得到掌握, 或者某种操作原则上已经能够进行。从描述的角度上看, 可以说这是习得的开端, 将注意力放在习得过程的开端可以使我们揭示习得的全过程。(张燕吟译)

从上述得定义中可以发现: 初现 (emergence), 作为习得的开端, 被定义为原则上习得 (acquired in principle), 这是中介语系统的一端, 中介语系统的另一端是完全掌握 (mastery)。

张燕吟(2001)的博士论文《语言处理论和汉语语法语素得习得过程》(*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Grammatical Morphemes: A Processability Perspective*)收集了三名母语为英语的澳大利亚学生学习汉语第一年的口语语料进行分析,考察了现代汉语中八个语法语素的初级习得过程。这八个语法语素是:表进行态的“正在”,表过去经验态的“过”,表所属“的”,标记名词或名词词组定语“的”,形容词后缀“的”,动词补语后缀“得”,量词,标记定语从句“的”。她采用了初现率标准来确定这八个语素在这三个学生的汉语中介语中的“初现点”(emergence point):“作为粘着词,任一语法语素必须粘于至少两个不同的词汇,如‘正在唱歌’,‘正在学习’,同时语料中必须有至少四个语法语境”。

以标记名词或名词词组的定语“的”的习得为例(p. 111),标记名词或名词词组的定语“的”有四个语法环境:

- 1) 连接代词和中心词 (你的书)
- 2) 连接单个名词和中心词 (老师的书)
- 3) 连接名词词组和中心词 (老师的女儿的书)
- 4) 不用“的”的连接 (我妈妈)

通过全面考察三个学习者使用“的”的分布情况(Distribution),四个语法环境进一步归纳为用“的”(Obligatory rule)和不用“的”(deletion rule)的情况,经总结得到下面这张表格(p. 117):

表二 标记名词或名词词组的定语“的”的发展(Zhang, p. 117)

被试	语境	1 wk5	2 wk10	3 wk13	4 wk15	5 wk16	6 wk23	7 wk26	8 wk34	9 wk37
Kate	不用 “的”	-	+	+	+	+	(+)			
	用 “的”		+	+	(+)	-	+	+	(+)	
Sharon	不用 “的”	-	+	+		+		+	+	(+)
	用 “的”	(+)	+	+	+	(+)		+	+	+
Dave	不用 “的”	+		+	+	+	-	(+)	(-)	-
	用 “的”	+	+	+	+	+	+	+	+	+

注：(笔者译)

(1) +: 符合初现率标准 (emergence criterion)

(2) -: 不符合初现率标准 (emergence criterion)

(3) () : 语境不充足

(4) 空格表示没有语料

从上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Dave 在第一次录音时（第五周）就已经习得了标记名词或名词词组的定语“的”，而 Kate 和 Sharon 在第二次录音时（第十周）才有类似的表现。同时作者指出：“标记名词或名词词组的定语‘的’”的初现只是习得的开始，接下来的发展有赖于进一步考察其使用的语境和带“的”的词汇的语义特征。

从张燕吟（2001）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使用初现率标准确定“初现点”时，通过对学习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特定的语言点，考察其使用的分布特征来进行描写的。为了避免语境不足的问题，应准备充足的语料（Pienemann, 1999）。

初现率标准近年来已被用于对语素和句法习得的考察，从它的理论出发点看，它能比较合理地描写和解释中介语这个动态的连续统的特征，努力发现学习者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和所经历的过程，这种方法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论立场。

### 3. 第一次初现和系统出现

在考察分布特征时，Pienemann (1998, p. 133) 特别提出：只初现一次的结构不足以提供充足的语境，它们可能只是些过度简化的用法，比如单个的词语，套话或是单语素，因此不把他们放在习得的范围之内讨论。这种区分 (Meisel, Clahsen and Pienemann, 1981; Clahsen, 1988; Pienemann 1984, 1998) 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单个的词语，套话或是单语素”在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中其实是有意义的，它们同样是承载一定意义的语言形式。

比如在对套话 (formulaic) 的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的看法。有的学者 (Krashen and Scarcella 1978; Dulay, Burt and Krashen 1982; Perdue, 1993) 对套话和语素-句法知识作了区分，认为套话只是中介语发展的前阶段的一种现象，并不是学习者的创造性的使用。相反，另一些研究者 (Clark, 1974; Wong-Fillmore, 1976; Perters, 1983; Pawley & Syder, 1983; Nattinger & DeCarrico, 1992; Clark, P 1996;).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套话是中介语发展中形成目的语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Wong-Fillmore (1976, p. 640) 认为套话的习得策略对学习语言很重要，它让学习者学会分析 (语言)，这是习得的前提。

Nicholas (1987, p. 23) 指出: 第二语言的发展体现为学习者使用新语言的最初尝试, 其中包含了可辨认的目的语的单位, 这些单位可以是词, 套语, 或是长一些的话语, 他们的语音特征可能正确, 也可能不正确; 他们可能合语法, 也可能不合语法。(笔者译)

综上所述, 在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中介语时, 如果从最开始关注它的发生, 发展和壮大的过程, 我们应该给学习者初次使用的那些语言形式应有的地位, 因为这些形式:

- 1) 是学习者能够使用的有效单位
- 2) 是学习者开始进行交际的初次尝试.
- 3) 在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中是有意义的.
- 4) 可以在日后中介语的发展中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这些形式可以不同于语言学家所界定的语言单位, 因为学习者的中介语在发展的最初阶段汇集了来自学习者母语的要素, 目的语的要素和既不是学习者母语, 也不是目的语的要素, 当然也包括了非词和非句法的单位。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中初始阶段这些各种各样的成分其实给学习者提供了发展中中介语的许多潜在可能, 因为这些成分可以经过分解, 提炼和修改而逐步接近目的语。因此, 使用初现率标准 (emergence criterion) 来描写中介语, 尤其是把最初的成分纳入到讨论的范畴中, 提供了一种可以更为清楚的了解中介语特征的视角。

为此, 我在博士论文《汉语“能”类助动词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考察》把初现率标准作了一定的修改, 采用第一次初现 (single emergence) 和系统出现 (systematic emergence) 来分别描述学习者的中介语在不同阶段的特

点。收集了一个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近一年，每两星期一次的口头语料（Interview）和来自三个大学的问卷。

**第一次初现** 指中介语系统中学习者使用的第一个有（词汇）意义形式。**系统初现** 指中介语发展中因学习者具备了建立形式和意义的联系的能力后大量使用的语言形式，在其中介语中可以发现不同的分布。

表三 Kim 使用的所有“可以”的初现（熊文, 2005）

义项		使用频率& 初现时间	使用频率	初现时间 (22次录音)
可以	key1: 能力		23	第五次录音
	Key1 2: 许可		14	第五次
	Key1 3: 可能		21	第三次录音
	Key1 4: 还可以= just so so, it's ok. (套话)		7	第二次录音
	Key1 5: 可以说 = can I say / I can say, etc. (套话)		13	第十五次录音
	Total		78	

Kim（学习者）在学习汉语初级阶段对“可以”的习得有两个清楚的阶段：在第十一次录音之前，可以的不同义项分别呈现，而且是份依赖对话者的提示。在第十一次录音时，学习者有了四个明显的变化，一是自发产出（independent use/spontaneous production）占据了主要的部分，21次使用中有19次是自发产出，二是从数量上讲，远远超出前几次的录音中“可以”的使用，所有以前出现的四个义项，可以1，可以2，可以3和可以4都同时被使用，三是句法结构较以前复杂，四是学习者第一次在表达“能力”这个义项时，出现了和“能”即“会”交替使用的情况。这些变化表明学习者的中介语发生了重构（reconstructing），具备了建立形式和意义的联系的能力，这

种联系表现在能对同一形式中不同意义的区别和联系，能采用不同形式对同一意义进行表达。因而 Kim 能够大量地，较为独立地使用“可以”（详见 Xiong, 2005），“可以”的分布如下所示：

表四 Kim 习得“可以”的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	None	第二阶段:	Keyi 1 (6: 3I+3D) Keyi 2 (2I*) Keyi 3 (3: 2I+1I*)
第三阶段:	Keyi 1(1I) Keyi 4 (2: 1I+1D)	第四阶段:	Keyi 1 (13:7I+1D+4I*) Keyi 2 (2: 1I+1D) Keyi 3 (4: 2I+2I*) Keyi 4 (3I)
第五阶段:	Keyi 1 (1I) Keyi 2 (1D) Keyi 3 (5I) Keyi 4 (1D) Keyi 5 (6I)	第六阶段:	Keyi 1 (6I) Keyi 2 (7: 2I+5D) Keyi 3 (3I) Keyi 4 (2I) Keyi 5 (5I)

Notes:

I: 不依赖对话者的使用

D: 依赖对话者的使用

区分出第一次初现和系统初现反映了学习者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中介语发展的深层变化和具体表现。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初现率标准是一个重要的描写中介语的标准，考察始于第一次初现，然后进一步发现第一次初现和系统初现之间的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个联系代表了中介语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发展，发现其中的联系可以解释学习者中介语是如何形成的，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如何对整个系统做出贡献和产生影响的，从而说明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第二语言的习得是一个渐变的，涉及到多个子系统的过程。

#### 4. 余论

这篇文章从三篇博士论文出发讨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标准问题，三篇论文都是在第二语言习得的大理论框架下，从汉语的特点出发，来探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若干问题。与本文讨论有关的习得的标准：准确率标准和初现率标准在各自的论文中被用来描写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中介语的发展。在实际运用准确率标准和出现率标准描写学习者的中介语时，上述三篇论文都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发展。

用不同的标准来确定中介语的习得，在具体使用中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比如对强制性语境的理解，准确率标准和出现率标准都用来考察中介语形式习的分布，但是准确率标准是用目的语得标准来考察学习者的中介语的，因此强制性语境主要是语法语境，而且对学习者的中介语采用了严格的二分法，即正确的和偏误。而初现率标准是从学习者的中介语本身来描写，所以强制性语境的内涵和外延都相对比较宽，学习者的有规律的偏误也可以是一种强制性语境。在考察时，有的学者用两个，有的用三个，有的用五个语境等等（Zhang, 2001），这一方面说明具体情况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理论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而且，使用强制性语境来考察分布情况，即使是形态型语言，有的范畴或形式由于不具备强制性语境，也很难用句法框架来考察其分布，更不用说像汉语这样缺乏完整的形态标志的语言。所以对学习者的中介语的特点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并结合汉语的特点，可以在更普遍的意义下理解和使用分布法，考察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以便形成更为适用的方法来描写中介语。

Clahsen, Meisel and Piemann (1983, also see Clahsen and Muysken, 1989; Meisel, 1991, p. 249) 提出第二语言的发展有如下五个特征 (笔者译) :

- 1) 有限的最终习得
- 2) 习得的速度较慢
- 3) 个体差异明显
- 4) 习得模式具有不连续性
- 5) 涉及到特殊参数设定的语法需要另外学习

在学习者中介语发展中, 从初现 (emergence) 到掌握 (mastery), 这个过程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情况, 并不是初现了的就一定会掌握, 因为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中介语系统中既有很早就初现, 但是一直都不能掌握的语言项目, 比如英语的定冠词, a 和 the, 汉语的“的”等; 也有初现得很晚, 但是马上就被学习者掌握的语言项目, 比如汉语的兼语句。这些种种的不确定性, 正是研究中介语, 研究习得过程的魅力所在。因此描写中介语决不是一件用一个简单的标准和操作方法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准确率标准和初现率标准都可以运用于描写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 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采用不同的习得标准, 首先要明确研究的目的, 明确研究的方法。如果要考察学习者中介语系统从开始到成长, 壮大的过程, 初现率标准更能准确地反映这个过程; 如果要把习得的研究作为教学排序的依据之一, 初现率标准更能体现到底那些语言内容可以先被介绍给学习者。准确率标准反映的是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相对稳定时候的特征, 在教学的环境中, 考察学习者的稳定特征可以反观教学中诸因素对习得的影响, 因此大部分考

察教学环境下的中介语特征的横向研究都会采用这个标准。但是准确率标准不能反映习得的顺序，这已为很多研究所证实（见 Larsen-Freeman & Long, 1991），因此在把这个顺序同教学排序结合起来，是前提错误。

在目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实证性研究日益得到重视的今天，许多研究（见前文）都为深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数据和报告，如何针对汉语习得的特点，形成有关的系统的研究方法等等，是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 主要参考文献：

1. Brown, R. (1973). *A First language. The early stag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Burt, M. K. and H. C. Dulay (1981). *On acquisition orders.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issues*: 165-327.
3. Larsen-Freeman & Long (1991).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Longman Inc. New York
4. Meisel, J., H. Clahsen, et al. (1981). “On Determining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Natural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2): 109-195.
5. Menyuk, P. (1987). *Language Development -- Knowledge and Use*. Boston,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U.S.

6. Nattinger, J. R. and J. S. DeCarrico (1992). *Lexical Phras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7. Nicholas, H. (1987).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German as A First and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 Department of German.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8. Peters, A. M. (1983). *The unit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Pica, T. (1984). "Methods of Morpheme Quantification: Their effec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cond Language Data."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6/1: 69-78.
10. Pienemann, M. and M. Johnston, Eds. (1987).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pply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Adelaide, NCRC.
11. Pienemann, M. (1998).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Processability Theor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Amsterdam/ Philadelphia.
12. Benjamin Q. Wang (2001) *The Early Stages of Chinese Interlanguag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by Three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he U.S.A.
13.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4. Schumann, J. (1978).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s factor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The Pidginization Process: a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5. Teng, S-h. (1999). The acquisition of "le" in L2 Chinese. 《世界汉语教学》 47/1, 56-63.
16. Xiong, Wen (2005)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Modal Auxiliary Neng Verb Group*,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17. Zhang, Yanyin (2001)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Grammatical Morphemes: A Processability Perspectiv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anberra, Australia.
18. 陈郡、周小兵：（2005）比较句语法项目的选取和排序，《语言教学与研究》，第二期，22-33
19. 黄月圆、杨素英：（200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把”字句研究。
20. 伏学风：（2005）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量词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二期。
21. 钱旭（1997）日本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世界汉语教学》 39/1, 94-101。
22. 施家炜：（1998）外国留学生 22 类现代汉语句式的习得顺序研究，《世界汉语教学》 46/4, 77-98。

23、孙德金：（1999）外国学生汉语体标记“了”“着”“过”习得情况的考察，《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论文汇编》，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术研究办公室。

24、王建勤：（1997）“不”和“没”否定结构的习得过程，《世界汉语教学》，45/3, 92-100。